

高校《中国历史文选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

朱韬

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，贵州贵阳，550025；

摘要：《中国历史文选》是高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程，在学生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当前教学中，“文选课”教学课时短、学生基础薄弱、教学内容交叉等问题凸显，通过增加课外学习时间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在讲授方式上，注意与其他专业课程知识互补等策略，可以有效的解决“文选课”所面临的问题。

关键词：中国历史文选；历史学专业；课程体系；教学改革

DOI:10.69979/3029-2735.24.9.026

《中国历史文选》（以下简称“文选课”）是当前高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程。学界常将“文选课”的设立追溯至上世纪 20 年代陈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的“史学名著选读”与“史籍名著评论”两门课程。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，“文选课”的教材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改革中日益完善。本文主要围绕“文选课”的教学现状展开讨论，提出自己对“文选课”改革的意见。

1 “文选课”的教学现状

我们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，概括出“文选课”在教学中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。

1.1 教学课时缩短

上世纪 20 年代，陈垣在北京大学开设“史学名著选读”课时，“学时是每周 3 时，一学期 54 学时，一学年 108 学时”^[1]。80 年代，张大可编撰单元制《中国历史文选》时，针对当时“文选课”教学时数缩短的情况，给出了指导意见，“文选课”“按一学年制，每学期 18 周，每周 4 学时计约 144 学时。”^[2]2015 年，朱清如根据高校教师自述，总结道：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，课程设置由最多的 2 学年减至 1.5 学年、1 学年，个别院校历史专业甚至降至 1 学期。总课时由最高时的 288 节减至 100 节左右，几乎减少了 2/3，有的甚至减至 60 节、54 节、48 节。”^[3]

“文选课”的教学课时从最高峰的 288 学时，在有些院校已经缩减到 48 学时，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，都应该进行革新。

1.2 学生基础薄弱

张大可在回顾“文选课”建设历程时，指出“陈垣所处时代，文言文废弃未久，当时的学子文言文水平都有相当的高度，‘名著选读’重点不是过文字关、过语言关，而是通过读原典，学习历史研究方法”，“而今

日学子，完全使用的白话，‘文选课’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语言文字关，提高历史专业学生阅读古书能力”。^[2]但据陈垣的学生刘乃和所说，陈垣之所以开设“史学名著选读”，其原因在于，五四运动后，学堂改为白话课本，学生不必学习文言文，但历史系中国史的学生又有读原始资料的需求，“青年们对读古书有了困难，如对文言文不掌握就没法自己动手翻阅古书原始材料”，陈先生认为历史系“应有专门讲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程”，因此设立了“史学名著选读”的课程。^[1]

也就是说陈垣和张大可虽然时代不同，但所面临的同样问题都在于学生的古文基础薄弱。

1.3 教学内容交叉

“文选课”对史料、史籍的介绍，与历史学专业《历史文献学》《中国史学史》等核心课程有不少重复交叉的内容。在具体讲授中，文选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、职官制度、地理、年代等专业知识，这些内容在当前高校历史专业课程体系下，或属《中国文化史》，或属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《中国历史地理学》等科目。

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，不只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，也关系到历史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。

2 针对问题现状的改革策略

面对教学课时缩短、学生基础薄弱、教学内容交叉的问题现状，需要从整体的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角度对“文选课”进行针对性的改革。

2.1 增加课外学习时间

不少学者都指出“文选课”是一门涉及训诂学、文献学、史学史等专业内容的综合性课程。而“文选课”教学课时的缩短，一方面是通识课程的增加，挤压了专业课程的时间，一方面也是专业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，有着综合性特征的“文选课”不得不释放出了所占据的

教学时间。

张大可提出,“文选课”除了一学年 144 学时的教学时间外,“练习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,时间比例般为 1:1,即总量为 144 小时”。^[1]在教学时间愈发缩减的当前,144 小时课外练习实践,也已经不能满足学好“文选课”的需要。且随着教学时数的缩减,课上的讲解只能够照顾到最核心的内容,这就需要学生在课前要有充分的准备。有鉴于相关选文对于新进高校学生尚有一定难度,其课下预习的时间,与课后练习实践的时间,也应该达到 1:1,即 144 小时。

2.2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

面对学生基础薄弱,也有不少高校教师指出,因为学生习惯了简体字的使用,辨认繁体字成为了“文选课”的第一关。但事实上,中学教育向大学教育的过度,有一项重要内容即自学能力的培养,特别是当前不管是纸质文史资料还是网络文史工具,已经普及的情况下。老师在“文选课”上所要做的并不是从繁体字开始给学生讲解文选,而是引导、规范学生如何正确、高效的使用文史工具。

学生在课前的准备阶段,应该要完成相关选文的识读、断句及理解选文大义。这些传统“文选课”上的重点内容,在当前的形式下,只能归为学生自主完成的基础部分。“文选课”教师在教学时段内,所要做的是帮助学生基础部分进行查漏补缺。如繁体字识读方面,要提醒一些特殊的用字,如“云”字,在什么情况下,写作繁体的“雲”,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写作“云”;“里”字,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繁体的“裡”,在什么情况下,又仍作“里”。把识别繁体字作为“文选课”的一关,不只是目前的教学时长不允许,也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。

2.3 与其他专业课程互补

“文选课”涉及的文史知识,虽然与其他专业课程有重复交叉,但在具体讲授中又有不同侧重。不管是《历史文献学》还是《中国史学史》《中国文化史》,作为本科课程,只是从整体上对相关专业知识进行概述,而不是深入文本进行解析。

如选文《百官公卿表》,是中国官职制度的重要文献,与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课程的学习可以形成很好的互补作用。有学者反对将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引入教材,认为《百官公卿表》虽然作为研究官制的史料尤为珍贵,但作为“文选课”的选文,“就显得太专门化,太偏颇了。而且内容又很多,洋洋洒洒,占了很大的篇幅,这就有些不适宜了,既不利于教学,也不利于阅读。

还有的把正史中的‘表’搬入教材中,‘表’本身的形式决定了它需要占据很大的面积,‘表’中的文字又少,又缺乏有机的联系。”^[4]

但事实上,“文选课”选择《百官公卿表》不只是为了“太专门化,太偏颇”,反而能够体现出历史学专业学习与一般爱好者阅读之间的差别。而仅选《百官公卿表序》,却不将篇幅较大的“表”选入,对于“文选课”来说才是“买椟还珠”。因为“文选课”本身的目的之一,就是要让学生接触更多种类的史料文献,教导学生学会如何阅读、利用不同种类的史料文献。学会利用史籍中的“表”,恰恰是“文选课”的责任,其他概论性的课程都很难兼具此任务。

3 “文选课”教学实践举例

增加课外学习时间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,将“文选课”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互补,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如何落实,我们以具体的教学案例来进行说明。

3.1 将学生的课外学习文本作为教学辅助课件

何晋指出传统的“文选课”教材,与学生“将来实际的文献阅读实践严重脱节”,“妨碍了同学们对古籍文献的认识”,主张直接影印原典或注疏本,“模拟同学将来可能进入的实际文献阅读状态”,“这样编选,重视与文献最直接的原始接触,一方面使同学们尝到了原汁原味,学习兴趣提高了;另一方面也使得这门课程的内容比以前更丰富了。”^[5]

朱清如则认为,“就‘文选’内容而言,不必每部教材都依古籍原貌复制或扫描,再现其‘形制’。这或能引起学生兴趣,但效果未必最佳。”朱清如提出“可制作古籍(善本)图片,利用多媒体展示,让学生有直观印象”。朱清如提出的替代方法,是高校教学中多媒体教学的常用手段,但这种“直观印象”对于历史学专业学生是否足够,则又是新的问题。而朱清如所说的“若学校条件允许,教师也可引领学生到古籍阅览室去翻阅古籍,趁机现场讲解一些最基本的古籍文献(学)常识。学生得以近距离接触古籍(善本),对相关知识的记忆无疑会更加深刻”,这当然是培养学生文史素养的较好方式,但“学校条件允许”看似简单,但已经将绝大多数高校都拒之门外,这既涉及到高校图书馆、古籍库的管理问题,也涉及学生的组织问题,在教学事故频出的当下,这种方法不只是对学校硬件设备、管理模式的高要求,也是对任课教师勇气的挑战^[3]。

我们在实际教学中,将何晋对文献原汁原味的强调,以及朱清如对于多媒体的利用结合起来。在课前,把未标点的古籍文献电子版提前分发给给学生,由学生自主打

印后进行识读、标点、断句、翻译等基础学习；在上课前将带有学习痕迹的古籍文献文本发回给任课教师；由任课教师挑选代表性的学生文本，制作为教学课件。这样做，既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又可以做针对性的讲解。

3.2 深入文本对专业知识进行探索

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“文选课”学习，不只在史料类型的广泛性上要与一般的爱好者拉开距离，在深度上也要下工夫，不能停留于中学古文教育的简单了解，而要在知其然的基础上，知其所以然。

如选文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总序》，论及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观史事，而后能定“一字之褒贬”。对“一字之褒贬”，张本注解曰：“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以‘垂法’为主，不重记事，文字极简约，运用书法的遣词用字来表达褒贬，如吴楚之君自称‘王’，而《春秋》贬之曰‘子’；践土之会实晋文公召周天子，而《春秋》讳之曰‘天王狩于河阳’，推此类以绳当世，扬善抑恶，含有‘微言大义’。”^[6]

张本注释本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如果作为通识性课程或者一般爱好者的阅读，依此注理解何谓《春秋》“一字之褒贬”自无可，但作为历史学专业的“文选课”，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和运用史料文献的能力。对《春秋》“一字之褒贬”的理解，如果仅停留于此，则仅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且会导致学生的懒惰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。如何让学生真正的理解何谓《春秋》“一字之褒贬”，仍要从《春秋》文本入手。

吴国与楚国的国君在《春秋》被称为“子”，除需要援引吴、楚国君称“王”的史实之外，尚需要将《春秋》所涉及的宋、晋、齐、郑、曹、莒等国君的称呼进行排列，在宋公、晋侯、齐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等称呼中，来凸显吴国国君被《春秋》记为吴子、楚国国君被记为楚子，其中所蕴含的“微言大义”。通过排列《春秋》义例，而获得史识，即所谓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”（《礼记·经解》）。学生籍此总结出《春秋》如何以“一字”为“褒贬”，比仅仅通过注解得到的结论，无疑更为深刻。

3.3 将史学研究融入文选教学

从教学实践上看，学生通过自主学习，可以完成字、词、句的基础学习，但对于选文中所涉及的史学问题，尚不能充分把握，这就需要教师进行针对性的讲授。如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，太史公记载了殷商王朝的世系：

契卒，子昭明立。昭明卒，子相土立。相土卒，子昌若立。昌若卒，子曹圉立。曹圉卒，子冥立。冥卒，子振立。振卒，子微立。微卒，子报丁立。报丁卒，子报乙立。报乙卒，子报丙立。报丙卒，子主壬立。主壬卒，子主癸立。主癸卒，子天乙立，是为成汤。^[1]

这一段在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史料，却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非常容易忽略的。由学生所忽略的《殷本纪》商王世系，教师可以引申出王国维通过缀合殷墟甲骨碎片所撰写的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》两篇开拓殷商王朝研究的重量级文章，并以此为切入点讲解二重证据法等史学方法。

又有《殷本纪》所涉及的“素王及九主之事”。其中“九主”，学生常根据司马贞《索隐》，以为“九主者，三皇五帝及夏禹也”或“九皇”也，而忽略了裴骃《集解》所引刘向《别录》言，“九主者有法君、专君、授君、劳君、等君、寄君、破君、国君、三岁社君”。一般皆以为刘向所录“九主”，“名称甚奇，不知所凭据”^[7]。但马王堆帛书《九主》的出土，却证明了刘向所引“九主”注解才是正确的。

以上这些历史学研究成果都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，很难涉及到的，需要任课教师进行开拓、补充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乃和. 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[A]. 见: 杨燕起, 陈泽延.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[M].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89: 275.
 - [2] 张大可. 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学百年省思[J].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, 2021(05): 100, 95, 101
 - [3] 朱清如. 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与普通高校之课程教学[J]. 武陵学刊, 2015(6): 139-140.
 - [4] 阎崇东. 《中国历史文选》教材与教学[J]. 中国大学教学, 2011(2): 89-90.
 - [5] 何晋. 新编中国历史文选[M],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7: 3-4.
 - [6] 张大可. 中国历史文选[M]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22: 6.
 - [7] 司马迁. 史记[M],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9: 92, 95-95.
- 作者简介: 朱韬(1988-), 男, 汉族, 中国史博士,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、贵州师范大学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、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间文献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, 研究方向: 中国思想史教学与研究。